

农机购补：繁琐手续催生“套补”链

河南开封 63 名农民因出借身份证代领补贴被判刑的背后

“农民申请购机补贴要到社区、办事处、县级农机部门来回跑多趟盖 6 个章，哪一环出错就可能申请不成。动辄以年计、“马拉松式”的补贴流程，让农民和经销商苦不堪言，甚至因此催生了代办、包办农机购置补贴的所谓“套补”产业链

本报记者李钧德、孙清清

农机购置补贴，是中央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繁琐复杂的补贴手续，动辄以年计、“马拉松式”的补贴流程，让购买农机的农民和销售农机的经销商苦不堪言。

为了能领到补贴，一些农民不得不长途跋涉，跨市县甚至跨省购机。为方便农民购机，不少农机经销商不得不采取借身份证等违规办法，帮助购机户“代办”“包办”补贴手续。在河南、山西等农业大省，甚至因此催生了代办、包办农机购置补贴的所谓“套补”产业链。

近期，在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就发生了两起农机经销商借当地农民身份证、帮助购机户套取购置补贴的案件。两名“代办”手续的农机经销商和 63 名出借身份证的农民，均以诈骗罪被判刑。领取农机购置补贴到底有多难？居然要以失去自由为代价？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2 名农机经销商牵连 63 名农民套取补贴资金被判刑

牛书军、孟庆安是开封市祥符区的农机经销商。自 2013 年以来，他们跨区到开封市鼓楼区借当地农民身份证，虚构鼓楼区农民购买农机事实，套取农机补贴资金 256.9 万元。最终，牛书军、孟庆安及 63 名出借身份证的农民被鼓楼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刑。

以牛书军为例，其为开封市祥符区鑫源农业机械销售处负责人，他套取农机补贴的行为主要发生在 2013 年以后。针对部分农民不愿全价购机和申请补贴难的现象，牛书军便垫资以补贴后的价格销售农机，再虚构购机事实，将补贴资金套取出来，既减轻了农民购机资金压力、省却农民申请补贴的麻烦，又能以低价提高农机销量，甚至有省外农民也不辞辛苦找其购机。

据鑫源农业机械销售处工作人员介绍，其公司“代办”补贴分两种情况：一是对符合补贴条件的农民，公司提供代办农机补贴服务，在以补贴后价格售机后，需要购机农民交 2000 元押



▲ 农民在选购农机。近年来推行的农机补贴政策一度激发了农民的“购机热”，但繁琐复杂的补贴手续、“马拉松式”的补贴流程却让农民和农机经销商苦不堪言。 新华社资料片

金，待补贴款到账后，由购机农民和公司人员共同把钱取出来；二是对不符合补贴条件的客户，由公司借农民的身份证，给出借身份证的农民 500 元“好处费”，而后由公司办理补贴手续。

据多位出借身份证的农民反映，农机补贴款拨到农民个人银行卡后，由经销商派人将钱取走，留给出借身份证的农民 500 元好处费。多数农民对出借身份证套取补贴的严重性并不知情。

“先买后补”全价购机“后遗症”

手续多、历时长

2012 年起，国家相关部委开展补贴资金级次下放、农民全价购机等新措施，农民从“差价购机”变为“全价购机、县级结算、直补到卡”。农民全价购机后，需携带相关手续自己办理补贴申请。

“先买后补”全价购机实施后，部分地区补贴指标紧张、手续繁琐和资金兑付历时过长，以致部分农民图省事、图便宜，不惜跨省、跨县找牛书军购机。

家在兰考县闫楼乡的赵先生，2013 年 6 月，跨县到牛书军处，以补贴后的价格购买了一台已提前报过补贴的小麦收割机。当他为何不在当地购机，他说：“在当地申请农机补贴，要花钱送礼，还要等一两年才会批下来，直接找牛书军购机，又便宜又省事儿。”

也有省外农民不辞辛苦找牛书军购机。齐先生是山东省阳谷县阿城镇人，2013 年跨省到牛书军处购买了一台玉米联合收获机。“我在当地享受补贴后买车的价格，也比我从牛书军那里买的贵。”齐先生说，2013 年，他询问当地农机经销商，玉米联合收获机价格是 11 万 4 千

元，经人介绍找到牛书军，仅需 10 万 6 千元便可把车提走。

在补贴手续繁杂方面，据受访购机农民张先生反映，“补贴不是申请难，就是太麻烦”。以开封市鼓楼区为例，农民申请购机补贴要到社区、办事处、县级农机部门来回跑多趟盖 6 个章，网上申请通过后，农民要在规定日期内购机，再将购机发票及复印件交给农机部门，后由农机部门回访查验是否真实购机。

农民申请补贴是“一环扣一环”，哪一环出错就可能申请不成。开封市鼓楼区农林牧机局工作人员坦言，“本来是给农民办好事的，农民跑了一趟又一趟，他们和我们都麻烦。”

县区间指标使用不均衡经销商“铤而走险”

农机补贴资金级次下放后，补贴资金由省级结算变为县级结算，各地补贴资金规模综合考虑各地耕地面积、乡村从业人员等因素确定。县级结算下，部分县区间补贴指标使用存在不均衡的现象。部分地区指标紧张，补贴申请难，历时长，甚至有农民直言要“托关系、走后门”。

以开封市的禹王台区和通许县为例，据河南省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 2017 显示，截至 2018 年 3 月 27 日，禹王台区和通许县中央补贴资金使用比例(含报废)分别为 8.18%、98.21%。

据业内人士反映，正是因农机购置补贴指标地区间使用不均衡，农业县指标不够用，城区用不完，使得经销商跨区套取补贴资金有机可乘。同时，部分地区补贴资金使用效率低，也增加了农民购机资金压力和时间成本。

从含糊称“某某”到点名道姓，从“涉嫌违纪”到“涉嫌违纪违法”，从“笼统罪名”到“具体罪行”

违法违纪官员“判词”之变透视反腐新变

“此前，“某某”的说法成为问题官员最后一张遮羞布，大约从 2014 年开始，中纪委和各地纪委在通报违法违纪官员时几乎全部直指其名。有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官员曾表露，宁可给自己再加重点处分，也不愿意被点名道姓公开曝光

本报记者胡靖国、王井怀

各地纪委监委网站都有一个类似“通报曝光”的栏目，用于公布各类违法违纪官员的“判词”。“判词”，是违法违纪案件调查的“节点”，也是群众了解真相的“起点”。一则则“判词”，不仅展现出反腐败斗争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反腐的新变化。

细细品读各地纪委监委网站公布的问题官员通报会发现，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工作在震慑力、法治化、预防性等方面方面悄然发生着变化。

从含糊称“某某”到点名道姓

今天，人们已经习惯通过纪委监委网站了解最新的官员落马情况，哪位官员违法违纪，大家一目了然。而仅仅几年前，人们还很少能在通报中看到真名实姓。

2013 年 11 月，山西省纪委通报过去一段时间的反腐情况，出现了“省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李某某”“晋城市政协原副主席申某”“长治市市委原副书记、市长张某”等字样。“某某”，成为问题官员最后一张遮羞布。

随着反腐的深入，遮羞布被扯下。山西省纪委监委第一执纪审查(调查)室副主任王增昂



说，大概在 2014 年左右，中纪委首开“点名道姓”的先河，此后，各地纪委在通报违法违纪官员时几乎全部直指其名。

“点名道姓”的震慑力有多强？王增昂认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一旦公布官员违法违纪问题，这名官员的污点将众所周知。有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官员曾表露，宁可给自己再加重点处分，也不愿意被点名道姓公开曝光。

从“涉嫌违纪”到“涉嫌违纪违法”

3 月下旬，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4 月 1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晓光成为国家监委组建后首个接受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

这次通报有了新变化。之前对问题官员的通报多是“涉嫌严重违纪”，这则通报中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之前为“接受组织审查”，现在则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山西省纪委监委第一执纪监督室副主任王芳认为，近年来纪委通报中关于纪与法部分出现两次明显变化。先是“纪法问题混合”，通报问题官员时用词为“违纪违法”；到 2015 年左右，通报中有“纪法分开”的趋势，纪委通报的案件中强调“违纪”；今年，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通过表决，“违纪违法”字眼再次同时出现在通报中。

王芳说：“这些变化，体现了我国在反腐败斗争中不断强化法治思维，用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方针。”

从“笼统罪名”到“具体罪行”

在 2013 年前后，纪委通报中经常出现，“本人或通过其亲属收受巨额财物”“贪污公款”“道德败坏”“滥用职权造成国家财政资金重大损失”等字眼，这些几乎成为那段时间落马官员“判词”中的“标配”罪名。

而近年来，一些“具体罪行”出现在大贪官

据牛书军的妻子李坤反映，2013 年以后，农民要全价购机自己申请补贴，“农民自己到农机局申请补贴几乎是不可能的，腿跑断有时也报不成”。在农民申请补贴难的情况下，为了提高农机销量，牛书军“铤而走险”，由其代办农机补贴申请。

据记者了解，经销商“代办”农机补贴之所以能成功，还在于相关部门查验购机真实性的机制不够健全。

据邵波等出借身份证的农民反映，经销商会提前教他们如何应付有关部门核实购机真实性。邵波介绍说，2013 年，他向牛书军出借身份信息后，牛书军给他打电话说有关部门要上门查验农机，派人开了一辆拖拉机到其家门口，次日，一男一女两个人来到他家，查验了拖拉机，又分别为他和农机照了合影后便走了，过了一段时间，补贴款便到了他的银行卡上，后由牛书军将钱取走。

减轻农民购机资金和时间成本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河南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常伯阳说，在农民全价购机、自主申请补贴的模式下，政府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一是针对符合购置补贴条件的农民，允许经销商提供代办服务，严查经销商为不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代办补贴申请，二是针对补贴资金兑付时间长的的问题，建议限定资金兑付时间期限，避免补贴兑付“遥遥无期”。

业内人士建议，减轻农民购买大型农机的资金压力，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健全对农民购机真实性的审核机制，加强对人机合影、回访查验等环节的工作力度，避免走过场，堵塞违法套取农机补贴的漏洞。

目前案件正进入二审阶段。对牛书军、孟庆安案是否构成诈骗罪，一些律师有不同的看法。常伯阳、河南论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郑建武等认为，针对农民购机不好办理补贴的问题，牛书军以补贴后的价格销售农机，而后借当地农民身份信息申请补贴，把钱收回来，不应视为非法占有补贴资金；从根本上讲，农机销售给了符合条件的农民，补贴实惠最终落到了农民，不能简单视为违法行为。

2014 年，原农业部办公厅在《关于山西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有关问题的意见》中，对“河北、河南等地农民借用山西省农民身份证，在山西购买农机具，并在山西省办理农机购置补贴手续”的情况，专门给出意见，认为：“河北、河南等地农民借用山西省农民身份证，在山西购买农机具，并在山西省办理农机购置补贴手续的行为有不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讲，农机具还是在农民手中，还是用于农业生产，补贴实惠最终落到了农民，符合中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导向，达到政策目的，不宜简单视为违法违规行为，也不宜将此认定为给国家造成资金损失。”

从含糊称“某某”到点名道姓，从“涉嫌违纪”到“涉嫌违纪违法”，从“笼统罪名”到“具体罪行”

违法违纪官员“判词”之变透视反腐新变

的通报中。比如，“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规报销个人费用”“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宴请和旅游”“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配备和使用公务用车”“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设立并使用小金库款项”“擅自改变财政资金使用”等等。

山西省纪委监委第七执纪监督室副主任牛小明认为，“具体罪行”的出现并增多，体现出纪检监察干部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的工作思路。这有助于对党员干部存在的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及时解决好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小错酿成大错。

“抓早抓小”是对干部最大的保护。一位参与调查山西省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案件的纪委干部对记者说，张中生认罪后对办案人员说：“要是有人在我受贿几万元、几十万元时找我谈话，我也绝不会受贿十亿元。”

严防“灯下黑”，纪检干部成“判词”主角之一

魏健、罗凯、朱明国、金道铭、曲淑辉、莫建成……近年来，一些纪检干部或长期在纪检监察系统任职的干部落马，成为纪委监委网站上被通报的对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绝大多数纪检监察干部认真履行职责，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出了贡献，纪检监察机关的影响力，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大提升。但也正是这种影响力，让一些纪检干部成了被围猎的重点对象。纪检干部如果滥用手中的监督执纪权，带来的危害会比一般干部更甚。

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从十八大以来到 2017 年初，中央纪委机关谈话函询 218 人、组织调整 21 人、立案查处 17 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谈话函询 5800 人次、组织处理 2500 人、处分 7900 人。

纪检监察机关坚决清理门户，严防“灯下黑”，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体现“打铁自身硬、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韧劲。2014 年，中央纪委成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专门监督纪检监察干部。

以前传销还有一个产品道具，现在是赤裸裸的思想控制，产品从经济道具变成了“人”，只要组织往下发展，控制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就能出头。而其犯罪手段也从“骗”变成了暴力

新华社记者胡靖国、孙亮全

山西临汾警方近日打击传销案件中，发现一些传统聚集式传销组织已经从经济犯罪质变成暴力集团犯罪，成为黑恶势力犯罪组织。他们通过暴力和强力洗脑等方式，能迅速将受害人培养成犯罪“工具”，“传销组织”竟然成为他们掩盖涉黑涉恶的外衣。

受害者半月左右变成犯罪“工具”

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近期在辖区摸排中打掉数个传销组织窝点，经深入挖掘，发现这些异地聚集式传销组织已经“变异”，所犯罪恶和社会危害触目惊心。

专案民警介绍，这些“传销组织”以招工、婚恋等名义物色受害者，将其骗到当地之后，通过暴力、洗脑等手段控制，半个月左右就可将受害者培养成合格犯罪“工具”。

其培养方式按成型“套路”“流水线”操作。第一阶段为“暴力屈服”，将受害者骗到窝点之后，采取暴力手段控制人身自由。第二阶段为受害者“上线”阶段，每天凌晨一两点就开始对受害人进行耗损体力、精力的折磨，同时其他人轮番实施洗脑、不给饭吃、殴打等软硬暴力。一般 7 至 15 天，多数受害人就会被迫屈服，“同意”掏钱购买“虚拟产品”。第三阶段为“老板”阶段，团伙会以一套骗人的、杂糅的所谓“精粹教材”开始“培训”洗脑，已经毫无抵抗能力的受害人一般半个月左右就会彻底“上套”。

成为“老板”后，这些受害者就迅速变成了害人者，开始配合团伙以各种借口向亲戚朋友骗钱，骗人入伙，对新入伙成员施暴。

与此同时，这个“传销组织”裂变极快，人员一旦发展到 100 人，就一分为二，各领 50 人觅地继续发展。警方介绍，尧都区被打掉的“传销组织”仅为省外一个组织裂变出的一条下线，2014 年裂变到临汾之后，除了在当地迅速发展外，已经在别的城市裂变出下线，临汾警方近日在运城城市打掉一批下线团伙。

“传销”成逃避打击遁词

专案民警表示，这些传销组织已经从市场经济领域犯罪团伙变成了披着“传销”外衣的暴力犯罪集团。

“以前传销还有一个产品道具，现在是赤裸裸的思想控制，产品从经济道具变成了人，只要组织往下发展，控制的入越来越多，自己就能出头。”专案民警说。

其手段也从“骗”变成了暴力，以前多是通过授课、洗脑后“卖东西”发展下线，现在则是依靠暴力手段绑架、非法拘禁，强势洗脑之后，进行诈骗等犯罪活动。

民警介绍，这些组织有极强的纪律规定。组织成员没有人身自由，数年不与社会接触，如为防止寝室成员互相熟捻，要求各个寝室成员一两个月交流一次。一旦被警方发现，“传销组织”标识反倒成为这些暴力团伙的“掩护色”，如某个寝室案发后，成员就主动交代“我是传销，我是受害者”，不涉及其他寝室，警方对普通成员只能做遣散处理。

合力破解打击难题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后，尧都警方在辖区摸排、发现了相关线索，会同当地检察院、法院分析研究、认定后，在全国首次以黑恶势力团伙犯罪进行立案侦查，刑拘了上百人，挖出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内幕。

警方介绍，这些“传销组织”侵害对象固定为一些外省份年轻人，临汾市的“传销组织”只针对四川、重庆、河南三地的年轻受害者，一旦他们被骗到窝点变成犯罪“工具”，就会侵害远在千里之外的亲朋好友和其他受害者。但窝点处于封闭小环境，成员不与社会接触，难以发现。

“清查时或接到求助线索发现传销组织后，看一下有无非法拘禁，对普通成员进行登记，买上车票遣散，但实际上到下一站他们就下车跑回来了。一个地方打击传销的力度上去了，他们就转移到其他地方。”一位基层民警说。

专案民警梳理近期打击的具有非法拘禁等雷同犯罪行为的“传销组织”，发现仅山西就有多个地市存在，已经处理的案件就有数十起。“这些案件事实上已经跟传销毫无关系，传销反倒将真正的罪名掩盖了。”一位专案民警说，必须合力破解打击难题。

新华社太原 5 月 16 日电



扫描二维码
关注新华每日电讯